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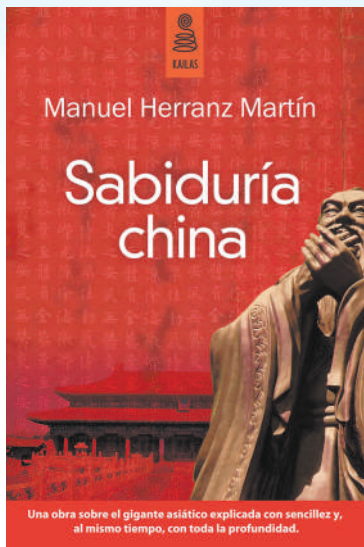
西班牙凯伊拉斯出版社社长费尔南德斯——

“为西语读者开启一段中国文学的旅程”

姜波



走进西班牙凯伊拉斯出版社，硕大的书架上摆满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图书，墙上贴满宣传海报，其中几幅莫言作品的海报格外引人注目。自2004年创立以来，凯伊拉斯出版社一直致力于让更多中国文学作品在西语世界落地。社长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从书架上取出中国作家的书籍，一边向笔者展示，一边讲述起这些图书出版背后的故事。



向西语世界推介中国作品

费尔南德斯出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曾经作为报社记者在海外派驻多年。结束记者生涯后，他创办了凯伊拉斯出版社，在业余时间也进行文学创作，是当地多家报纸的专栏作家。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2000年，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和长沙等很多城市，中国悠久的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趟旅行让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费尔南德斯说，出版社成立之初，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多，因此他的初衷便是要将更多亚洲和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西班牙民众。

2005年，费尔南德斯读到莫言的英文版小说，莫言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让他深深着迷。“在我看来，莫言是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应该向西语读者分享他的作品。”然而在当时的西班牙，只有《红高粱》曾在多年前被翻译成西语，西语世界的读者对莫言并不熟悉。2006年后，他开始系统地将莫言作品广泛推介到西班牙乃至整个西语世界的出版社，目前已经翻译出版了16本莫言作品。这些作品在西班牙和拉美地区发行，受到当地读者的广泛欢迎。“我最喜欢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费尔南德斯表示，这部作品通过动物的视角，以宏大的叙事手法描绘了数十年中国农村历史发展变迁的画卷，富有原创性又充满想象，是莫言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

2008年，凯伊拉斯出版社特别邀请莫言来到西班牙，出席西班牙语版《天堂蒜薹之歌》的新书发布会。其间，费尔南德斯陪同莫言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城市出席了多场文学研讨活动，吸引了众多莫言读者和中国文学爱好者参加。令费尔南德斯尤为难忘的，是莫言与西班牙作家欧亨尼奥·苏亚雷斯-格尔万·盖拉的交流互动，虽然他们一个

不会说西语，一个不会讲中文，却成了好朋友，文学是他们共同的语言。现在，盖拉也是莫言的忠实读者，每次出版莫言的书籍，他都会阅读并分享心得。“在短短一周的相处中，我与莫言分享了彼此对于文学的看法，我也了解到他的经历和文学创作历程，这令我非常难忘。”费尔南德斯说。

培养中国文学的忠实读者

自2000年以来，费尔南德斯多次前往中国，见证了中国飞速进步与发展。在他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如今，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更多可能性，中国人民也变得越来越开放自信。他说：“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日益深厚。看到中国取得这样伟大的发展成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费尔南德斯也希望更多西班牙民众可以了解变化中的真实中国，这也是出版社成立以来便致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中国经典的古代文学和现

代文学作品是凯伊拉斯出版社非常重要的产品线，翻译出版的书籍包括《论语》《道德经》《阿Q正传》等。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将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推介到西语世界，已经翻译出版了包括韩少功、王安忆、吴晓波等作家的多部作品。这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书籍，为西语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受到广泛欢迎。费尔南德斯认为，中国文学作品能够在西班牙获得认可与欢迎，除了作品自身文学水平较高以外，还源于近年来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西班牙读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文学作品是读者了解中国的窗口，我们要努力满足西语读者不断增加的阅读中国的需



求，希望更多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费尔南德斯说。

在中国作家之外，出版社还将目光投向西班牙作家创作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出版了《中国智慧》等书籍。很多作者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通过他们的观察和讲述了解中国，是另一种认识中国的方式。“随着中国文学作品的版图不断扩大，我们培养了许多中国文学的忠

实读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出版社和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感兴趣，书店里的中国文学书籍也越来越多。”在费尔南德斯看来，他们所从事的翻译出版工作非常有意，加深了他与中国的联系。“出版书籍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班牙令我非常自豪，我会继续坚持这项事业。”他说。

加强两国文学作品交流

自首部莫言作品西语译本在西班牙获得巨大成功以来，后续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也都取得不错反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和西语国家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这些作品在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销量也在不断增加。费尔南德斯说，很多读者会致信出版社，分享阅读这些书籍的感受。出版社每年参加马德里、伦敦和墨西哥等世界大型书展时，都会有读者专门来到他们的展位求购某部中国文学作品，还有人前来表达他们对于出版社能够翻译推介中国文学的感激之情，这都令他感到格外欣慰。

因在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2015年，费尔南德斯获得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能获得这个奖我感到很荣幸，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的信心。”费尔南德斯说，“很高兴有机会为西语读者开启一段中国文学的旅程，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段旅程真正爱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费尔南德斯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加强相互了解才能更好地欣赏对方。他以自己的3个女儿为原型，创作了儿童文学系列《洛洛塔冒险记》，作为绘本发行出版。这套书正在陆续翻译成中文，能够帮助中国民众认识和了解西班牙文化。“伴随西班牙与中国的人文交流越来越频繁，西中文学作品将在对方国家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受众和市场。”费尔南德斯说，我们要继续努力推进这一趋势，将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推介至对方国家。他也将和中国同行一起努力，希望未来可以出版更多更好的中国文学作品，为西中两国文化交流搭建起一座宽阔的桥梁。

- 1 图①：凯伊拉斯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作家作品《中国智慧》。
- 2 图②：王安忆作品《长恨歌》(西语版)。
- 3 图③：费尔南德斯正在翻看西语版的《红高粱家族》。
- 4 图④：费尔南德斯创作的《洛洛塔冒险记》。

这是妻子对在太空飞行的丈夫的“独白”，倾诉她的思念和忧愁。这首歌曲旋律深沉，直抒胸臆，浪漫地表达出对爱的渴望。20世纪60年代，《柔情》风靡一时，成为宇航员加加林、科马罗夫、莫索洛夫等人最喜爱的歌，还传唱至法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

巴赫慕托娃谱写的《老槭树》《旋律》《我别无选择》等爱情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感情深刻细腻，让人感到纯洁忠贞爱情的甜蜜与美好。她曾经说：“歌曲——这就是爱。”她用歌曲点燃自己的“爱”，用歌曲传递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她用歌曲告诉人们怎样相爱，怎样生活，怎样度过人生。

巴赫慕托娃蜚声世界，她忘记年龄，也没有退休的概念，虽已年过九旬，还在继续音乐创作。近年来，她在音乐剧、协奏曲和歌曲创作上推出新作，仍像年轻时一样，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在俄罗斯音乐会和电视屏幕上，常常能看到巴赫慕托娃充满活力的身影，像常青树般永葆艺术的青春，书写着俄罗斯音乐界的传奇。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mr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1759年11月10日，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于涅卡河畔的德国小城马尔巴赫。那里离斯图加特不远，当时属于符腾堡公国。因为在军中服役的父亲常需调防，公国各处都留下了席勒童年的足迹。他自幼天资聪颖，口才过人，在14岁那年被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相中，不由分说地把他录取进公国军校“卡尔学院”，先是学习法学，后来又改修医学。但年少的席勒却发自内心的抗拒这一桩旁人眼中的恩典。他厌恶学院内与世隔绝的生活与刻板僵硬的规章，更厌恶卡尔·欧根大家长式的独断，不止一次地想象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一切。

彼时的德国正是“狂飙突进”文学崭露头角的时候。1774年，青年歌德匿名发表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维特不愿屈从于僵化的封建礼俗，最终选择殉情。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一股新文学的风潮席卷德国。身处“卡尔学院”的席勒也深受触动，在心中悄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一边学习，一边偷偷创作诗歌和剧本；即便是毕业后被派往斯图加特当军医，也没有中断写作。正是在“卡尔学院”的压抑氛围中，席勒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强盗》，并于1781年匿名自费出版。这部剧讲述了贵族青年卡尔·封·莫尔被人陷害、落草为寇，却依旧胸怀惩恶扬善英雄气概的故事。当《强盗》于次年首演时，观众如痴如醉，剧中振奋人心的台词让他们坚信，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席勒还需忍耐。由于他未经准假就私自离开连队前往曼海姆，卡尔·欧根公爵关了他禁闭，且禁止他再发表文学作品。席勒知道，自己不能再留在斯图加特了；创作的笔既已拾起，就无法再屈从于强力。1782年9月，他与同伴逃离了符腾堡，同时继续写作，接连完成了“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叛乱》以及“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在后一部剧中，席勒讲述了贵族青年费迪南与市民少女路易丝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尽管两部作品叫好不叫座，但他在其中却赋予了戏剧极高的期待：当法国的启蒙主义者还在争论文学艺术是否会败坏社会风俗时，席勒在1784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将戏剧奉为坚守正义的“道德和法律更为深刻持久”。

只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他本想成为曼海姆剧院的常驻作家，但合同却未获延长，自费出版所欠的债务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认可与崇敬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家境富裕的科尔纳不仅为席勒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支持，还懂得倾听、理解、欣赏席勒的每一个念头，在思想上与他产生强烈共鸣。在这里，席勒再度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他用一首《欢乐颂》为这段友谊立下了丰碑。日后，贝多芬将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而它也将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传唱至今。

因为科尔纳的帮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这部历史剧取材于尼德兰联邦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而赢得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但却预示了日后历史的发展。在《唐·卡洛》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洪流中化为瓦砾。席勒本人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一段时间之后，席勒逐渐意识到，相比起政体更迭，民众的教育与启蒙才是革命最核心的任务。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化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

诗与哲学的深度交融

毛明超

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之美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淳真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深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篇《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

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席勒先是迁居耶拿，后搬至魏玛，并结识了日后的挚友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二人于1794年初初次相识就一见如故。他们一个注重自然经验，一个强调思辨与理念，在美学观念上两相互补，却又同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写出动人心弦的诗篇。自1795年歌德为席勒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到1805年席勒溘然长逝，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最高峰的“魏玛古典文学”黄金十年。时至今日，在魏玛剧院正门前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这一对双子星的塑像：席勒在左，歌德居右，二人共握象征诗人荣耀的月桂花冠；席勒左手握着一卷书稿，微扬着头，目光炯炯，仿佛正眺望着他在诗中所吟诵的那必将实现的理想。

与歌德的交往让已近不惑之年的席勒更加成熟。他褪去了些许青年时的冲劲，笔下增添了几分凝重与厚重；他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美也无法抵御时间的冲击；但若若是人们诉诸内心，寻找尚未被世间喧嚣所触及的意志的领地，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大的不幸中，人依旧可以保有心灵的崇高，坦然面对各自的命运，并由此证明精神自由远在物质必然之上。

于是，他在剧中不再试图塑造现实世界里种种不可调和的对抗，而是将目光转向历史，描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个体。戏剧三部曲《华伦斯坦》勾勒了试图与瑞典和谈而结束30年战争的华伦斯坦如何死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玛利亚·斯图尔特》展现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如何带着尊严迎接死亡；《奥尔良的童贞女》则以圣女贞德为原型，诉说了她如何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中带着必胜的信念牺牲。在这些戏剧中，只有重现瑞士独立历程的《威廉·退尔》以胜利结尾：神射手退尔除掉了暴虐的总督格罗斯，而瑞士先民则在巴林湖畔的吕特利草地上喊出了著名的誓言：“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碰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

席勒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期望的。然而，他却并没有能够看见德国的统一。早年的困厄与疾病已挖空了他健康的根基，不知疲倦的写作又耗尽了精力。1805年5月9日傍晚，时年仅46岁的席勒与世长辞。他如同一颗彗星划过德意志的天际，在短暂的一生中释放出理想主义的光彩。

来自伏尔加河畔的作曲家

未名

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有关纪念活动上，常常看到一位坐在钢琴边弹琴的老人。她身材矮小，有力的双手娴熟地在琴键上飞舞，弹奏出的旋律与整个乐队的演奏融为和谐交响，感染着每一位观众。她不时扭头看看指挥，用眼神与独唱演员互动……她就是俄罗斯著名作曲家亚历珊德拉·巴赫慕托娃。

巴赫慕托娃今年已92岁，依然精神矍铄，活跃在俄罗斯音乐界。她从小就显示了出众的音乐才能，4岁创作小歌剧《公鸡歌唱》，11岁已能登台演奏自己写的音乐作品。卫国战争前，巴赫慕托娃已小有名气，在一些报刊的音乐评论里常能看到她的名字，在纪录片《少年音乐家》中也曾出镜。卫国战争让她音乐之路中断了两年，但巴赫慕托娃最终还是完成了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研究生学业，走上了专业作曲家的道路。

1953年，巴赫慕托娃的毕业作品《交响组曲》标志着她作为专业作曲家的创作生涯开始。她的音乐创作体裁多样，以歌曲居多，这些歌曲既继承了俄罗斯民歌的传统，又吸收了现代音乐的创作技法，旋律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她的歌曲充满崇高理想和乐观精神，鼓舞人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敢于向命运

挑战，展现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巴赫慕托娃谱写的歌曲反映俄罗斯现实生活，涉及20世纪俄罗斯社会的重大事件，若把它们连起来，就是一部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音乐编年史，具有很高的艺术史价值。如今，巴赫慕托娃已走过近70年的音乐创作历程，共创作了400多首不同题材的歌曲，成为继纳耶夫斯基、布朗杰尔、索洛维耶夫·谢多伊等著名作曲家后的又一位俄罗斯歌曲创作大师。

巴赫慕托娃来自伏尔加河畔，俄罗斯大地和伏尔加的河水养育了她，祖国在她心中地位神圣。卫国战争期间，她目睹了人们为保卫祖国与法西斯浴血奋战，感受到他们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加深了她心灵深处对祖国的热爱，她将这种爱化为音乐旋律。

1958年，导演费·菲利波夫执导的影片《在那一边》展现共青团员在国内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影片主人公马特维耶夫深入白军后方，在巷战中壮烈牺牲。影片公映后，主题歌《歌唱动荡的青春》很快传遍全国，年轻作曲家巴赫慕托娃也因此成名。这首主题歌歌颂爱国主义、勇敢的斗争、纯洁的友谊和美好的爱情，催人奋进，奠定了巴赫慕托娃日后歌曲创作的爱国主义基调。歌曲的独唱部分旋律高亢激越、铿锵有力，重唱部分和

声优美、旋律抒情。全曲最后以充满浪漫情感的副歌结束：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爱情是俄罗斯歌曲的主题之一，巴赫慕托娃的创作也不例外。女作曲家歌颂的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漫步，而是战斗里的友谊和劳动中的爱情。爱情歌曲的主人公是在战火中与心爱的人“勇敢地穿过风和浪”的姑娘，是不怕牺牲飞往太空的宇航英雄，是在西伯利亚不惧严寒开垦荒地的青年男女，是在茫茫荒原上勘探、让爱更加灿烂的地质队员……

在巴赫慕托娃谱写的爱情歌曲中，献给宇航员的《柔情》几乎家喻户晓。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航天事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成为宇航员是许多俄罗斯青年的梦想。巴赫慕托娃深知这份职业的危险，每一次太空飞行都是生死考验，因此，她捕捉一位宇航员妻子的内心独白，写出《柔情》一歌：

离开你呀，脚下的地球变空……
 叫我如何来消磨光阴？
 尽管花园里落叶依旧，
 尽管街上来往车辆匆匆……
 离开你呀，地球格外空荡，
 你翱翔太空，繁星满天
 赐给你脉脉柔情……